

佼佼者。尤其经过近年来的改造、提升,其防洪等级按五十年一遇设计,但实际上早已超过百年一遇的水准,成为货真价实的“百年大计”。这预示着,黄泛区黎民百姓千百年来担惊受怕化为乌有,听闻黄河浪涛拍岸而高枕无忧的诗情画意,则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由平地下车步行,经过一条缓慢而长的沥青公路来到村里,眼前的一切,令人生出无法想象的吃惊。所有的宅院,式样大气、高挑,外观色彩干净、整齐。宽街小巷,没有乱贴乱画,不见乱堆乱放,更无乱搭乱盖。马路划出清晰的交通标志线,盏盏路灯让人想起夏夜的清凉与冬夜的温暖。式样新颖的垃圾箱侍立街头,自来水、天然气家家户户,电商服务中心铭牌高悬,免费无线网络覆盖全村……

站在村头极目四望,在热情的主人饶有兴味的“指认”帮助下,看到了隐约远处几处高台上的村庄。它们的建设面貌,或许已超过了高家村,或许正追赶着高家村。耳闻目睹,叫人在追寻中涌起阵阵感慨。我突生念头,这周遭所有高台村庄的来世今生,与我曾去过的福建永定土楼、广东开平雕楼,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假以时日,这种黄河文化的载体之一,会不会瓜熟蒂落般地成为宝贵的遗迹呢?由此衍生开去,利津的黄河滩区,迎来宜居宜业宜游的明天,还会遥远吗?

情感

灵动在小城的绿

雅安 口源麟



瓦洛夫作《阿乔索夫的孩子》插图一(木刻)

对于一个在川西小城住惯了的人,像我,如果没有满目的绿,没有冷冷的河流,没有温润的空气和淳朴的民风,便觉着身处异乡,倍感不适和陌生。

古城穿经——我的家乡——“清风”“雅雨”之间。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了小城一份温和的气候,温和的气候带来季节的软风刀子轻划,切割得窗明几净四季分明,充沛的雨水冲刷早晨淡黄昏,太阳出来,在大中国的西南亮出一块带着水绿的土地。

绿意盎然的小城,每个季节的绿也各不相同。从初春的嫩绿到夏季的翠绿,从秋季的墨绿到冬天的灰绿,尽管深深浅浅却都让我动容。动容于那绿色中蕴含的勃勃生机,动容于那从天到地的绿色透亮世界……但是其中最让我恋恋难忘的绿,却不是小城周边高耸的翠黛,也不是杨柳岸如烟的柳丝,更不是身边随处可见的一帘草色。而是母亲河的绿衣!

小城的母亲河其实是由两条河流构成。靠北一条叫荣河,靠南一条叫经河,经河荣河最后在县城的最东南处汇合交融成荣经河。因此经河荣河仿佛母亲两只温柔的披着绿装的手臂,将小城轻轻环抱其中。

看着那些青山,偎着两条丰盈的碧,小城的人们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的脸上便会浮出笑意,便会升腾出一份暖暖的幸福。小城也因此绿意中灵动起来,鲜活起来。

我儿时的旧居就在经河河畔,小平山最东的末端山脚处。许是自小临水而居,每日与经河朝夕为伴,以至于对于家乡两脉流动着的河流,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愫。

孩童时代皆是在经河河畔度过,只是那时尚幼,怎么懂得河流对于一座城市的意义?只是单纯地喜欢经河丰盈的河床,碧绿的衣裳,喜欢跟她嬉戏。只要有空就会趴在河滩找寻漂亮的小石头;抑或在一尾尾小鱼快乐游弋里欣喜不已。当然也喜欢在清晨巴士守候那轮从马耳山跃出的红日,一次次惊艳于它投影在经河的美丽。尽管那不是残阳,可也能感受“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之意境。

那时的河水清花绿亮,急流处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深处处如翡翠幽潭,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可不论河水深浅,但每当想起张俞,正是那个写“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首千古名诗的作者时,还是不免为之心惊。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面对黄河

天津 口赵玫

被誉为中华文明摇篮、赞作母亲河的黄河,有着桀骜不驯的天性,漫长而曲折的上游、中游,在九九八十一弯的旅途上,尽管使出种种咆哮嘶吼,种种怒发冲冠,种种东闯西扑,苦于高山峡谷的制约、管束,终究未能挣脱宿命般的羁绊而翻腾起危害甚烈的恶浪,只能归顺由西汇聚的流向,奔向大海的东方。

当黄河跌跌撞撞来到河南境内,置身于丘陵与平原的全新地理环境,其顽劣天性得到前所未有地释放,放纵般地懈怠起来,将裹挟泥沙的“豪迈”弃尽。源源不断的黄土高坡的泥沙,仍在毫无遏止地涌来,年复一年淤积在中原大地。

人们锲而不舍地重复着周而复始的劳作,利用黄河严冬时偃息旗鼓的短暂宁静,挖土筑坝,稳固河床;或是顶着汛期“黄龙”卷土重来的猖獗,置生死于度外,昼夜守护险情迭出的堤防。正是一代一代勤劳、苦难的黄河儿女对家乡难以割舍的眷恋,艰苦卓绝的奋斗得以延续,繁衍不息的家

族得以延续,支撑人们生存的悲欢离合得以延续。

顺理成章,延续下来的还有黄河两岸两条雄奇的大堤。泥沙肆虐的河床,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逐年提高。高出地面三米五米,甚而十米八米,已属家常便饭。于是,在延伸无边的河道旁,在两岸芸芸众生的头顶,在田园、工矿、城镇的上方,一条汹涌澎湃的河,昼夜不息地流过。这便是小时候屡屡听说的让人莫名恐惧的“悬河”景观。

随着悬河的概念趋于淡化,依托黄河休养生息的民众也自然平安无虞。就在前些天,有了一次探访的机会,地点就在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利津县。黄河洪峰越过利津水文站,彻底注入渤海,虽然尚有百余公里的前行,但依照惯例,这便是黄河顺利入海的标志。所以,称利津为黄河下游的下游,显然是十分精当的。

言谈话语中,“黄患”早已成为村子里老一辈村民数十年前的遥远记忆。对年轻一代来说,村南不远处高

高的大堤,堤外黄涛滚滚的河水,仅仅只是一道寻常至极的毫无故事的家乡景致而已。

我明白了,母亲河洗心革面的今天,其实就是他们,正与我愉快交谈的他们,平安富足的他们,自信满满的他们,以誓死不屈的信念创造出熠熠闪光的世间奇迹。远古以来,高家村的所有平畴旷野,皆系黄河冲积而成。按道理,全都可以打造出肥沃的良田,只需应时撒播庄稼、菜蔬的种子,就一定会蓬勃起丰收的兴旺。只不过,在数千年来的岁月流逝中,喜人的景象多为农人的奢望。而多数年份,富庶的大地无不水黄漫漫,颗粒无收,浸透了人间苦难。当黄河流到今天,一切都已改观。尤其此刻,九月初秋的时刻,高家村名副其实,居高临下,像一艘乘风破浪的巨轮,游弋在无边无垠的绿海之中,已然成为独具黄河滩区人文特色的代表性景观。古往今来的滩区民居,为躲避水害,都会事先平地筑筑高台地基,然后建房造屋。高家村便属其中的

地方

从张俞《蜀望丛帝新庙碑记》说起

成都 口庞惊涛

所医理。”可其奏,遂客于邛。举不如意,凡樽俎语言,皆无惊,侑人不敬侍之。或怒至以双指扣其脸,侑者泣诉于公,公曰:“尔辈岂知,此是龙图破性。”

仁宗朝名臣、散文家尹洙因坐以公使钱为部将偿还债务事而贬监筠州酒税,时任筠州郡守赵可度是个曲意逢迎、揣测上意的小人,眼见尹洙失势,为了巴结尹洙的对头,时任宰相吕夷简,对尹洙百般凌辱。驻守在邛州的好友范仲淹不得不向尹洙施以援手,请求朝廷批准尹洙到邛州来养病。到邛州的尹洙变得极度敏感而暴躁,但凡饮食言语稍有违他所意,皆不给好脸色。更有甚者,尹洙还要用手指捏人脸。仆人不得不哭着向范仲淹告状,范仲淹知道尹洙心中苦闷,只好劝慰仆人说:这正是龙图大学士坚硬的脾性。

尹洙不久病逝,年且不及五十,诚可伤也。赵可度“酷加凌忽”在其中究竟有没有直接作用,今天已难证实,但他“迎时好恶”的官场姿态,确难与张俞“治郭有称”的赞美相悖并论。有人怀疑说,这样的历史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呢?《湘山野录》约成书于神宗年间,神宗距仁宗朝不足十年,即便以仁宗朝1041年和神宗朝最晚的1085年计算,也左不过四十余年。文莹以一个出于尘外的僧人身份,记录四十余年前仁宗朝掌故,其内容应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

在一些地方志里,我还看到了关于赵可度的记录。一是清同治《建昌府志》所列南丰县职官表:“赵可度,(景祐)元年任。”二是民国《南丰县志·秩官》:“赵可度,景祐以大理寺丞任。”两条记录可以佐证赵可度在景祐元年(1034年)曾任南丰县令,但政绩如何,地方志里没有进一步的记录。

从时间线上来看,赵可度任南丰县令在前(1034年),为郫县令在中(1041年),而为筠州郡守则在后(1047年)。13年间,仕宦3地,都是蕞尔小邦的小官员,其间官场倾轧红黑颠倒的经验教训应该也见识了不少,因此也不排除他开始尚是一个“治郭有称”的循吏、混到后来干脆“黑化”了的可能。

倒是尹洙的气量与格局始终如一。在公使钱案中,御史刘湜借机打击报复尹洙,虽然查无实证,尹洙最终还是遭到了贬官处理。但尹洙从不提刘湜打击报复他这回事,这让好朋友孙甫很不理解,有一天忍不住问尹洙,你为什么从不提这件事呢?尹洙回答说:“他(指刘湜)不过是秉承



蜀望丛帝新庙碑记

宰相的意思办事而已,我从不恨他!”面对害过他的人,尹洙一点都不怨恨。所以,即便赵可度在筠州对他“酷加凌忽”,他也应该一点都不怨恨赵可度吧。

后人总是善良的,他们从此记下了赵可度在扩建望丛祠这个盛典上的“红色”功劳,而选择性忘记了他在打击尹洙这件事上的“黑色”历史。张俞谦退而恭谨的碑文里,赵可度成为总其事的有为地方官,就此名垂青史。

然而,赵可度的“红与黑”,并非孤例。早在南朝齐明帝时期,时任益州刺史刘季连,就已经演示了一个地方官员的两面性,而且好巧不巧,他们都是望丛二帝合葬及望丛祠之成今日规制的关键人物。

按《梁书·刘季连传》,有关刘季连在成都的事迹记录如下:明帝心德季连,四年,以为辅国将军、益州刺史,令据遥欣上流。季连父,宋世为益州,贪鄙无政绩,州人犹以义故,善待季连。季连下车,存问故老,抚纳新旧,见父时故吏,皆对之流涕。

这段文字最有意思的在于“犹以义故,善待季连”8字。意思是说,成

都人很讲情义,虽然刘季连父亲在担任益州刺史时“贪鄙无政绩”,但面对儿子刘季连继任益州刺史这个事实,他们还是不计前嫌,给了刘季连好脸色。刘季连在见到父亲的门生故吏时的当场洒泪,更像一场红脸动情的政治表演,很快就博得了成都人的好感。《梁书》没有记录他在任益州刺史时将祭祀望帝的崇德祠从灌口移建于邛,并与从帝庙合并成为合祀望丛二帝的“望丛祠”的事迹,却对他后来称霸于蜀、办事刚愎酷狠、为政残酷而导致各郡县叛乱此起彼伏的事实记录甚详。或许,刘季连本来就是一个极度黑化的酷吏,合望丛二帝祠而成望丛祠的历史功绩,只是他在任益州刺史时偶然正面化的意外收获罢了。

刘季连后来被一个叫蒲道恭的仇家当街刺死,结束了他黑化的一生。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这些黑化的历史,后来竟被慢慢弱化,直至被人们遗忘,他合望丛二帝祠而成望丛祠的历史功绩,却被人千意铭记。是历史太过粗心大意,还是人们太过善良而健忘?作为蜀人之后,望丛二帝千秋祭祀不绝有了这个庄严盛大的庙堂,人们似乎理所当然记了他的“红”,忘记他的“黑”。

张俞对赵可度乃至任中师的谦退,除了他为人通达的一面之外,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明白一个千古不易的大道理:凡文教大业及盛事之所成,必赖于地方长官之种为,文化人的主张和记录,只是一种微小的襄助,就像供养人和佛像的关系,供养人虽然出力甚大,但是能在高大的佛像脚下留一个微小的印记便应知足,要和佛像平起平坐,那是一种意识和光芒上的僭越,有极高的风险。

因此,在张俞看来,赵可度执行并完成了望丛二帝的合祀和望丛祠的扩建,是可以“一俊遮百丑”的,他这一项光芒万丈的政治作为,足以遮蔽他那些微弱的黑暗。张俞像无数蜀人一样,只记住了刘季连合望丛二帝祠而成望丛祠的历史功绩,而选择性地淡忘了他那些黑化的历史。

好在还有一块陈翠写下的《杜宇鳖灵二坟记》,让我们在今天可以看到张俞两次出面力主修复古蜀帝墓的事迹,明白张俞的谦退,确乎碍于他只是个隐士的身份。但是每当想起张俞,正是那个写“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首千古名诗的作者时,还是不免为之心惊。

名家



赵玫 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已出版《朗园》《武则天》《高阳公主》《上官婉儿》《秋天死于冬季》《漫随流水》《林花谢了春红》等长篇小说;《岁月如歌》《我的灵魂不起舞》《寻找伊索尔德》等中短篇小说集;《从这里到永恒》《欲望旅程》《左岸左岸》《一个女人的精神生活》《博物馆书》等散文随笔集;《赵玫文集》《赵玫作品集》及《阮玲玉》等电视剧剧本,计900余万字。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庄重文文学奖、首届鲁迅文学奖等。

去望丛祠,很容易忽略靠近阊门的两通石碑。

这两通石碑,一为宋人张俞的《蜀望丛帝新庙碑记》,一为清人张日晟的《岷阳新庙望丛古帝碑》,皆是普通红砂石材,通高不足2米,因风雨侵蚀,已见灰败之相。

张俞是北宋时期郫邑有名的大隐士,也是和文彦博、苏舜钦等士大夫有交游的大诗人。据他在碑记中所陈,望丛二帝合葬新庙落成后,时任益州牧乐安公“命辞来祭”,而“赵君乃躬执祀事”,张俞作为当地名动一时的大诗人,只是领命创作了碑记,而非非望丛二帝合祀祠动议的发起和执行人。

“益州牧乐安公”当指时任枢密直学士、知益州任中师。因任中师是乐安郡大族任氏后人,故称“乐安公”。而“赵君”则指时任郫邑令赵可度。很显然,张俞人虽在野,但却很懂官场规则,将这次可能载入历史的功绩,推于成都府和郫邑两级地方长官,而将自己前后多次建言、推动58名邑人联名提交诉状要求寺庙不得侵占从帝之墓为田地等事功隐到了幕后。

那么,在推动望帝与从帝合祀并扩建望丛祠这件影响深远的盛典上,究竟是张俞的建言打动了任中师、任中师再费钱可度完成的,还是赵可度在得到58名邑人的联名诉状后向任中师主动请缨而推动完成的,历史的细部一旦深入,我们就会发现,人性的幽微复杂,绝非碑记所记的那样体面堂皇,也非历史记录的那样全然不用怀疑。作为隐士的张俞和作为地方官的赵可度乃至围绕望丛祠的另一个关键人物,都不免呈现他们或红或黑的两面性。

赵可度《宋史》无传,张俞的碑记最后留下了一点点线索:“赵君名可度,字叔仪,治郭有称,观其所举可知也。”评价正面积极而且算比较高的了。赵可度为郫邑令当为北宋仁宗康定二年(1041年),他在郫邑还有其他哪些政绩,因查无史料,难以佐证张俞所赞的“治郭有称”是否符合事实。或许在张俞看来,仅因推动扩建望丛祠这一桩政绩而言,赵可度就可以享有这4个字的评价了,所以活该他留名“红”砂石。

在北宋僧人文莹所撰笔记体野史《湘山野录》里,我还是看到了赵可度“黑”的那一面:范文正虽极端方,而笑谑有味。师鲁时谪筠州监榷,郡守赵可度迎时好恶,酷加凌忽。公为邛师,特奏曰:“尹洙多病,可惜死于僻郡,乞令就任